江逢辰詩的鄉邦意識與蘇軾情懷

江曉輝*

一、前言

對嶺南詩歌發展影響最大的三位唐宋詩人，要數張九齡(678–740)、韓愈(768–824)和蘇軾(1037–1101)。張九齡留下「曲江規矩」，影響深遠，自是公論。張九齡之後，被謫來潮的韓愈固然是大文豪，在潮州興辦教育，功不可沒。然韓愈寓潮時間甚短，留下的詩文、軼事及遺跡不多，加上他對嶺南甚感厭惡，急欲離去，故其對嶺南文化、文學的影響，以及受嶺南人喜愛的程度，實不如後來的蘇軾。蘇軾謫惠州近三年，相關詩作近兩百首，他視惠州為終老之地，融入群眾，留下不少事跡，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故東坡詩及東坡文化允為張九齡以外，嶺南地區極為重要的詩學資源。

然而，東坡詩及東坡文化對近代嶺南詩人有何影響？汪辟疆(1887–1966)〈近代詩派與地域〉梳理嶺南詩派的譜系，指：「嶺南詩派，肇自曲江；昌黎、東坡，以流人習處是邦，流風餘韻，久播嶺表。宋元而後，沾溉靡窮。」¹但關於東坡對近代嶺南詩人的影響，卻無提及。陳永正主編《全粵詩》，以「標舉唐音」和「詩風雄直」²為嶺南詩的兩大特色，也略提及韓、蘇對嶺南詩壇影響極大。³

拙文為香港樹仁大學研究資助、筆者與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吳志廉助理教授共同主持「《江孝通遺集》整理及江逢辰與近代嶺南東坡文化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之一。承蒙香港樹仁大學的資助，深表謝意。三位評審委員深刻犀利的意見，使拙文更為周延，特此一併致謝。

* 江曉輝，香港樹仁大學兼職講師

¹ 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9。

² 陳永正：〈前言〉，收入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1冊，頁28–30。

³ 同上注，頁32。

其《嶺南詩歌研究》作了補充，列出近代受東坡影響的嶺南詩人，不過未作細究。⁴既然東坡對嶺南詩有重要影響，實大有深論的空間，以揭示嶺南詩更豐富的內涵。同時，研究東坡留下的事跡和景觀，如何被近代嶺南詩人加以運用和闡揚，成為嶺南文化及文學的重要象徵，能夠為嶺南文化的構成和特色，提供更豐富的說明。

要探討上述問題，就要聚焦東坡被貶謫之地，亦即東坡文化最濃厚、相關遺跡最多之地——惠州。同時，亦應探析受其影響最深，並將之具體反映於詩中的近代嶺南詩人。筆者發現近代嶺南詩人中，江逢辰(1859–1900)是深受東坡影響的典型。江逢辰乃惠州府歸善縣人，仰慕東坡，宗尚其詩，「東坡」作為一個文化和文學符號，在詩中極為頻繁地出現，且其遺集中更有一卷〈和東坡寓惠詩〉，追和東坡寓惠之作。就筆者所知，似未有其他詩人有過此舉——即使是在嶺南推揚蘇詩，使學蘇風氣轉盛，晚號「蘇齋」的翁方綱(1733–1818)，亦未如此系統地和蘇。江逢辰的遺集《江孝通遺集》(下簡稱《遺集》)只有1934年的線裝鉛印本，流傳極稀。筆者在撰文之前，先整理其遺集，發現他不只傾慕東坡，也具有強烈的鄉土意識，藉書寫鄉邦來歌頌東坡，藉歌頌東坡來書寫鄉邦，兩者互相結合，正好呼應上述議題。

職是之故，本文從江逢辰的詩作入手，考察東坡在嶺南留下的文學作品、文學景觀和生平軼事，在數百年後是如何由後人加以運用、深化、更新，成為近代嶺南的重要詩學資源的，並進一步探析當中蘊藏的人文地理學的意義。考慮到學界未必知悉江逢辰及其《遺集》，故在以下論述中，首先介紹其生平及《遺集》的梗概，作為討論的背景。據筆者所知，學界對江逢辰的研究大多介紹其生平軼事，鮮有專著聚焦研究《遺集》。⁵故筆者將於此文以《遺集》為主，對江氏生平及作品進行引述、分析。其次，由於東坡寓惠留下了大量的遺跡、景觀，而江逢辰對此又表現了濃厚的鄉情，故第三部分從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視野考察其鄉邦書寫。最後，通過對東坡寓惠之作及《遺集》的對讀，從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角度，探析江逢辰如何透過「追和」的方式，應和與闡揚東坡精神。

⁴ 詳參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2。

⁵ 筆者按：至2024年4月17日為止，筆者檢索「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學術輯刊全文數據庫」、「華藝線上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香港中文期刊論文」〔下轉頁89〕

二、江逢辰生平及《江孝通遺集》的梗概

江逢辰，字孝通、兩人，號密龕、白水山民，廣東歸善（惠州）人，生於清咸豐九年（1859），卒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江逢辰雖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幼年家貧，先後就學於惠州豐湖書院、肇慶端溪書院、廣州廣雅書院，皆師從梁鼎芬（1859–1919）。由於江逢辰與梁鼎芬同齡，且才行甚得梁氏器重，故雖名為師徒，但梁氏實以兄弟視之，梁氏〈歸善江生執業甚恭考其文行佳士也贈之以詩〉云：「水木清深講舍開，得人勝獲百瓊瑰。義猶兄弟真投分，行盡江山識此才。」⁶可見其推許，後又引薦江逢辰為張之洞（1837–1909）幕僚，蒙張之洞周濟其家。後中己丑（1889）恩科鄉試，又中壬辰（1892）進士，以主事分戶部山西司行走。

甲午戰爭（1894）爆發，顯官奔逃，江逢辰恪守職責，憂憤嘔血。翌年，江逢辰任會試的彌封官，掌管廣東的試卷，有人欲以三千金賄賂，拒而不受。由於性好遨遊，思鄉心切，「君自以生惠州，為東坡舊遊地，讀其遺書，沈然思與之為歸」。⁷遂辭官南歸，遊歷長江。因聞母疾，旋即還鄉，任教於赤溪遵義書院，使當地士風為之一變。江逢辰侍母疾「號泣露禱，形神俱瘁」、「以薯芋為飯」。母病歿後，於墓旁搭一草棚，獨居守孝，「冬不裘，夏不帳，哭無時，夜無睡」，終以病卒，年僅四十一歲。

江逢辰是惠州近代有名的詩人，其詩學太白、退之、長吉、玉谿、飛卿，而以東坡為宗。其〈和坡公廬惠詩既成序〉云：

〔上接頁 88〕

索引」等資料庫及系統，均未見有研究江逢辰之學位論文或單篇學術論文。吳定球：〈憂憤詩人江逢辰〉，收入惠城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惠城文史資料》（內部發行，2021年），第17輯，頁315–17；吳定賢：〈惠州才子江逢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惠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惠州文史》（內部發行，1997年），第8輯，頁82–85；林金水：〈戊戌變法成員江逢辰在赤溪〉，《炎黃天地》，2014年第2期，頁34；葉偉強：〈歸善縣城江孝子〉，收入葉偉強等：《惠州文史及其他》（惠州：東坡書畫院，1999年），頁74–75等，都只是簡述江逢辰生平事跡，非學術專文。

⁶ 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六卷》，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1923年），卷1，頁13。

⁷ 筆者按：本段中引文皆錄自梁志文：〈清故中憲大夫戶部主事江君墓碣〉，收入江逢辰：《江孝通遺集》（自印本，1934年），上冊，無頁碼。本文所引江逢辰之作，除特別注明外，悉引錄自此書，逕於引詩及引文後標明卷次及頁數，不另作注。

人有所宗則百變不離，入水火不灼濡，窮天淵不迷離，文章亦然。兒時聞人稱坡公意，大父行至識字，發帙取公詩讀之，愛不能捨。……又求之於百家歌詩，其愛之之懷終不敵。(卷17，頁1)

可知甫識字便讀蘇詩，東坡的精神乃是他思想的底色。他學唐賢諸家，可視為融唐入宋的學習過程，到了辭官南歸，「已歷長江，益交天下名士，志氣舒發，詩境一變，遂卓然樹嶺南一幟矣」。而這與「君自以生惠州，為東坡舊遊地，讀其遺書，沈然思與之為歸」⁸是分不開的，正是對東坡精神和詩歌的深刻領會，才使其詩兀然自立。他的同鄉好友李綺青(1859–1925)指他：

為詩初效唐賢，晚規宋格。自遊廣雅，再客武昌，師友得證淵源，江山益加神助，故能敷辭綿麗，持律精嚴。清深之思，半參玉局；綺艷之作，偶仿金荃。⁹

「晚規宋格」、「清深之思，半參玉局」，正指出他以東坡為宗尚。梁志文(1869–?)及李綺青共同指出他的遊歷與交友對其詩作的影響。他在外地的遊蹤不算廣，時間亦不長，主要是上京赴考時途經江蘇、上海一帶，考試及任官時留在京、津三年，以及南歸時遊武昌一帶。但對於嶺南景點，卻多有遊歷，尤其於羅浮山、白水山及西湖，更是一遊再遊，賦詩甚多。其間與之唱和同遊的師友同年，有梁鼎芬、李綺青、曾習經(1867–1926)、梁啟超(1873–1929)、魏馥(1860–1927)、何藻翔(1865–1930)、陳伯陶(1855–1930)、麥孟華(1875–1915)、梁士詒(1869–1933)、冒廣生(1873–1959)、楊銳(1855–1898)等，大多是嶺南的名士詩人。江逢辰亦擅詞，其《孤桐詞》及《華鬢詞》是惠州現存最早的詞集。他還精於藝事，書、畫、印皆享盛譽，如梁啟勛(1876–1965)所述，「書、畫、詞、賦、刻圖章、調印色、酒令詩籌，無一不工」。¹⁰由於精於藝事，廣結嶺南書畫家，因而其詩集中的另一特色，就是有不少論藝之作，乃研究晚清嶺南藝壇不可多得的材料。

江逢辰的作品多經手定，去世後，其遺稿本由梁鼎芬撰定，留待刊行，卻因人事多磨而未果。1906年，其外甥曾應嶺海報館之要求，將稿件編輯排印，

⁸ 梁志文：〈清故中憲大夫戶部主事江君墓碣〉，無頁碼。

⁹ 李綺青：〈序〉，收入《江孝通遺集》，上冊，無頁碼。

¹⁰ 梁啟超：〈與江孝通聯句〉詩後梁啟勛所記，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16冊，「飲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頁2。

後來又因故未能出版。直到1932年，始經惠州文史學者張友仁(1876–1974)倡議，向鄉人舊友集資助成，桂站(1865–1958)參與校訂。從〈跋〉的落款可知，《遺集》之出版不早於1934年。¹¹自江逢辰逝世至《遺集》出版的三十四年間，估計遺稿都由其親人私藏，很少對外流通。這三十多年間，正是晚清民國詩編集、研究的重要時期，江逢辰卻因遺集未及刊行而被學界、詩壇忽略，導致相關研究至今仍然缺乏。

《遺集》為線裝鉛印本，分上、下冊，共存詩1,074首、詞208闕。筆者將十九卷的梗概整理為附表1。

參考附表1的時間順序，結合他的生平來看，《遺集》內容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89年以前，江逢辰考獲舉人前的求學時期，這階段的活動範圍不離廣州、惠州、肇慶等地，都在廣東省內。此時他遍遊省內名勝，特別集中在故鄉惠州，詩作以遊覽記勝為主。第二階段為1890至1895年，是他離鄉赴考、在北京供職及南歸遊歷時期，此時期他離開嶺南，在上海、蘇州、北京、天津、武昌等地活動。第三階段是1897年後。江逢辰因不適應官場和思鄉憶母而南歸，鄉情的召喚使他對很多景點一遊再遊，一寫再寫。但以東坡精神為安身立命的依歸，與第一階段的描寫又有不同。他對東坡的仰慕集中展現在〈和東坡寓惠詩〉，他將追和東坡之詩獨立成卷，置於詩卷之末，大有總結的意味。

三、戀地與景觀：文化地理學視野下的鄉邦書寫

晚近西方地理學由側重自然地理的研究，漸漸轉向關注地理與人類社會、文化的關係，形成文化地理學。遊覽記勝——尤其對嶺南的書寫，一直是江逢辰詩歌的主題，他追慕的東坡精神，也寄寓在故鄉的山水景觀中。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可以探析嶺南獨特地理、文化、景觀，與其詩歌的關係。

(一) 嶺南傳統與文學地理

研究文化與地理關係的學科稱為「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克朗(Mike Crang)指出：「文化地理學研究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研究人們

¹¹ 見桂站：〈序〉，收入《江孝通遺集》，上冊，無頁碼；劉鏡湖：〈跋〉，收入《江孝通遺集》，下冊，無頁碼。

如何闡釋和利用地理空間，即研究與地理環境有關的人文活動，研究這些空間和地點是怎樣保留了產生於斯的文化。」¹²嶺南的地理形勢，正有利於產生及保留其獨特文化。

眾所周知，嶺南（本文所謂嶺南乃指廣東省而言）北方五嶺橫亘，與省外交通困難，自古與北方少有來往，形成了相對隔閡的地理形勢。如此的地理形勢，一方面使北方的中原文化難於進入，另一方面使嶺南具有獨特的民俗、特產，自成風氣。但一旦北方的文化進入嶺南，卻又因地域的隔閡而得以保留，不易隨北方政治、文化的變動而變動，變成嶺南的文化土壤。這種天然的地域隔閡形勢有助於形成「戀地情結」（topophilia）。「戀地情結」是美籍華裔學者段義孚（Yi-fu Tuan, 1930–2022）杜撰出來的詞語，「其目的是為了廣泛且有效地定義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¹³使地理學由純粹空間研究轉向研究人地關係的情感向度。他認為人的感知和地理之間能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是依賴一個適當的尺度，如果此尺度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的單元，就比用權力拼湊出來、內部處於異質關係的帝國，更能與人建立密切關係。¹⁴嶺南是一個自然地理單元，它不像中原文化所寄託的帝國，因過於廣大和經常變動使個人的情感難以覆及與維持，反而具有更強的同質性和穩定性。雖然中國很多省份都有相當強的凝聚力，但嶺南北有五嶺為界，東南有海為限的形勢，使嶺南有著很多省份都不具備的自然地理單元特質。加上長時間處於帝國文化與政治的邊緣，被視為「蠻」，故「嶺海人的精神文化傳統與嶺北各地域均具異稟，表現為粵人的民性、品格特徵、粵族身份意識的強固這幾方面」，¹⁵形成梁啟超所謂「廣東亦若自外於國中」的特點。¹⁶

嶺南因偏遠落後，古時常被朝廷用作流放貶謫，這正是北方文化進入嶺南，而又內化為嶺南文化的途徑之一。曾大興強調文人「貶謫」和「流寓」嶺南對嶺南文化的影響，並統計自東漢到明，至少有271位文人「貶謫」和「流寓」於此，¹⁷

¹² 克朗(Mike Crang)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

¹³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頁140。

¹⁴ 同上注，頁154。

¹⁵ 韓強：《嶺海文化：海洋文化視野與「嶺南文化」重新定位》（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頁223。

¹⁶ 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7冊，「飲冰室文集之十九」，頁76。

¹⁷ 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42–49。

韓愈與蘇軾正是當中的代表。他們帶來的北方文化與本地文化相融合，與其在嶺南的遊跡、建設和題賦，形成嶺南重要的文學景觀。這些景觀並非單純是自然地理的景物，如克朗所指：

我們不能把地理景觀僅僅看作物質地貌，而應該把它當作可解讀的「文本」，它們能告訴居民及讀者有關某個民族的故事，他們的觀念信仰和民族特徵。¹⁸

為此，曾大興提出「文學景觀」的概念：所謂文學景觀，就是指那些與文學密切相關的景觀，它屬於景觀的一種，卻又比普通的景觀多一層文學的色彩，多一份文學的內涵。¹⁹嶺南文學景觀的背後寄寓了嶺南文學和文化的內涵。²⁰

嶺南的文學地理書寫可以東漢南海人楊孚（生卒年不詳）《異物志》為開端，此書為第一本記載嶺南風土物產之書。「異」字凸顯了嶺南事物奇異、荒異的特點，嶺南的奇異色彩在此後一代又一代的「異物志」書寫中加強，有三國吳人萬震（生卒年不詳）的《南州異物志》、唐人房千里（生卒年不詳）的《南方異物志》、唐人孟瑄（生卒年不詳）的《嶺南異物志》、《宋志》所載無名氏的《嶺南異物志》，共同塑造了嶺南獨特的文化。以詩歌形式的文學地理書寫且聚焦在具體景觀上，則有宋人方信孺（1177–1222）《南海百詠》以百首七絕分詠廣州的名勝古蹟，詩前詳列位置及淵源考據，其〈序〉云「境以詩名，在在皆詩也」、「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跡也，可考者百而綴以詩」，²¹道出其詩與地理的關係；及後明人張詡（生卒年不詳）、清人樊封（生卒年不詳）都有《南海百詠續編》之作。分題歌詠廣州名勝的傳統，甚至成為了書院課藝的內容。成書於道光五年（1825）的《學海堂初集》，是阮元（1764–1849）在1820年任兩廣總督時於廣州創辦的學海堂書院課藝的第一次結集，《初集》第十一、十二卷就是諸生分和方信孺

¹⁸ 克朗：《文化地理學》，頁41。

¹⁹ 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研究》，頁118。

²⁰ 筆者按：對文學景觀的研究稱為「文學景觀學」，文學景觀學是文學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文學地理學所涉極為廣泛，鄒建軍將之區分為16個分支學科，文學景觀學乃其中之一。本章正是從文學景觀學的角度，考察江逢辰與這些文學景觀的關係。鄒建軍之區分見其《文學地理學批評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73。

²¹ 方信孺：〈南海百詠序〉，《南海百詠》道光元年（1821）甘泉江氏藏影鈔元本，無頁碼。

《南海百咏》之作，其後刊行至《四集》，其中，對廣州景觀及「蘇跡」的賦詠²²一直是詩課的重要題目。入選《學海堂集》的詩中佔壓倒性多數的可以稱為「鄉土風俗」詩，做這樣的詩歌習作要求學生對地方上的人、物產、風景，或文學成就進行分類、描述或讚美。²³ 學海堂詩課重視本地題材的風氣，又擴散到廣州的其他書院。²⁴ 由楊孚的《異物志》到方信孺的《南海百咏》，再到學海堂的課藝，對嶺南文學景觀的書寫，強調其異於中原的文化特色，成為嶺南重要的文學傳統。文學傳統和訓練，不只加強了「戀地情結」，同時也為文人對土地的情感提供了適切的抒發、表達方式。

江逢辰雖非出身於學海堂，卻是在這種傳統和風氣下成長的，而且，廣雅書院的精神正是注重鄉邦文化。²⁵ 他遊歷嶺南，詩歌描寫了大量文學景觀，當中正展現了這些內涵。

曾大興曾據歷代重要的嶺南文學選本，統計了十七項出現最多的嶺南文學景觀，²⁶ 江逢辰之作便涵蓋了其中九項，佔了過半，其著作中涵蓋的景觀遠超曾大興所列之十七項。他描寫的景觀非常多，《羅浮集》中遊覽景觀的具體程度，串連起來甚至可作遊記看。卷首〈南海〉一詩所寫雖非具體景觀，未列入附表，但可作討論的開端：

鬱鬱衣冠氣，茫茫割據年。東來雲出海，南極水浮天。郡邑仍秦漢，輿圖接楚滇。魚龍深窟宅，日月大山川。異物楊孚志，荒經伯益編。番禺開地脉，牛女應星躔。巖峒標朱洞，渾涵下紫濛〔濛〕。²⁷ 城隍千耦井，潮汐萬腴田。禾易隨時熟，花常占候先。家增養蠶戶，人富采珠船。俗既同奢麗，功誰仗變遷。重洋歸控馭，五嶺關關鍵。卉服徠夷島，蛟人雜市廛。飛輪通絕域，籌筆此雄邊。欲攬登車轡，高吟寶劍篇。

²² 翁筱曼曾統計在學海堂四本文集中，蘇軾的作品是擬作課題中被摹擬得最多的對象，「在學海堂的山水古跡類課題中，蘇軾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詳參翁筱曼：〈蘇軾與嶺南文學——由清代學海堂之文學教學談起〉，《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50、52。

²³ 麥哲維（Steven B. Miles）著，沈正邦譯：《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171。

²⁴ 同上注，頁170。

²⁵ 周漢光：《張之洞與廣雅書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508。

²⁶ 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研究》，頁288–90。

²⁷ 筆者按：此詩用下平一先韻，原文「濛」字為下平十蒸，不協韻，應為「濛」之誤。

青紅噓蜃氣，腥毒滌蛟涎。鬪虎思良將，騎羊問古僊。霸才歸落寞，奇甸瞰孤懸。黃屋臣陀去，金裝陸賈旋。粵文開士燮，秦難首梅鋗。更有精忠旅，兼多崛起賢。大招天水沒，風度曲江傳。直駕中原盛，休云地軸偏。奧區千浸滙，雄勢百蠻連。(卷1，頁1)

如果說江逢辰將〈和東坡寓惠詩〉置於詩卷之末是有總結的意味，則此詩置於詩卷之首，就有著開宗明義、宣示主旨的意涵。「南海」乃古行政區名，秦時置南海郡，隋時置南海縣，治區大小雖有變化，一般都指嶺南。此詩用「南海」這古名為題，顯然有追源溯始之意。詩歌強調了幾個重點：在地理上凸顯其位在大陸南緣，背嶺面海，有運用海洋資源與海外交流之利；在物產上由於地理關係，水陸百貨均有，氣候炎溫，莊稼易熟；在人口上有不同種族共存；在歷史上淵源古早，並非近世才興起；在政治上易於割據，長年孤懸；在文化上人才輩出，民性精忠激烈，成為華夏文明的最後防線。凡此皆證明嶺南不亞於中原，不應只視為一隅之地。曾大興曾從文學家、古代書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和名村、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幾方面的地理分佈，以大量研究數據證明「廣東在傳統文化方面不僅不是沙漠，甚至在若干領域還是全國少有的一片綠洲」，²⁸大可為此詩的註腳。此詩由歷史、地理的大尺度下筆，包舉大氣，既概括嶺南的特徵，又可見其對嶺南文史風俗的熟悉與自豪。

〈南海〉強調故鄉淵源有自，物產豐盛，人文昌明，在歷史長河中對嶺南作俯瞰式的總覽。相較〈南海〉的大敘述，他即目所見、以竹枝詞體載信筆所寫的風俗、活動構成的日常情景，則表現出強烈的生活感和濃厚的情感，詩的語言也更為通俗親切。竹枝詞上承十五《國風》，本就有著文化地理的內涵，明、清兩代竹枝詞大為興盛，前面通常冠以地名，強調某一地方的風俗文化。其〈廣州竹枝詞〉其一：「南關官船高建牙，東關民田多種花。北關人不識羅綺，西關人不識桑麻。」通過簡單對比就寫出廣州城東、南、西、北「四關」居民的不同生活狀況；其三：「玉山山色照番禺，珠江江水接蘭湖。郎住玉山清似玉，娘住珠江朗似珠。」寫廣州山明水秀，人亦得山水之清靈；其六：「花埭車陂玉帶河，嘗新人比鯽魚多。荔枝香過江瑤柱，香桃甜過蜜波羅。」(卷1，頁2)寫以前芳村一帶

²⁸ 詳參曾大興：〈從文化要素的地理分佈看廣東在全國的文化地位〉，《嶺南文化的真相：嶺南文化與文學地理之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23-36。

盛產水果，吸引遊人。荔枝、江瑤柱、香桃、蜜波羅說明了廣州炎熱臨海、物產豐富的地理特點。其他還描寫了歌舞岡的變化、女性的香船生涯等，都是廣州的風俗。

祠廟墓園乃先人生平的總結，精神之所繫，特別是地方前賢的祠廟墓園，象徵著該地的文化精粹。江逢辰對這些嶺南的景觀有不少描寫，如〈虞仲翔祠〉寫「心事屈平似，功名賈誼憐」（卷5，頁9）的虞翻（164–233）因被中傷，慘遭放逐，老死嶺南。〈韓廟〉寫一代文宗韓愈寓潮，「精神上引知何處，被髮騎麟下大荒」（卷6，頁5），鄉人建廟祭祀；〈游龍山葉少保墓〉寫葉夢熊（1531–1597）生前誅亂破寇，位至太保：「吾鄉當前朝，勳業推葉公」（卷5，頁8）；〈楊文懿祠下作〉寫楊起元（1547–1599）、葉萼（1486–1545）、葉夢熊、葉春及（1532–1595）、李學一（1534–1589）合稱的「湖上五先生」，在「中原盛門戶，異學罪萌芽」（卷5，頁6）的時候，卻把惠州的學術推上高峰；〈野吏亭〉寫因言事被貶惠州的陳堯佐（963–1044），自嘲為「野吏」，築「野吏亭」，「翹館接賓難忘處，黃碑蘇榜動流連」（卷6，頁5），歷來多名人題詠。以上諸人，除「湖上五先生」是惠州人外，其他都是被貶逐嶺南，如曾大興所指，「貶謫」和「流寓」對嶺南文化影響深遠。江逢辰拜謁這些祠廟，強調鄉賢在中原學術囿於門戶之時，卻在鄉邦將心學和理學、實用和理論，兼容並包。外地學者因不為權勢所容而流落嶺南時，能折不折其志，凸顯嶺南重視道德大節、學術文章的傳統，可以海納百川，存養文士元氣。

按文化和語言，嶺南可分為廣府文化區、客家文化區和潮汕文化區。江逢辰本身是客家人，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客家文化區的惠州，他南歸後所任教赤溪書院的所在地赤溪，亦是典型的客家地區。赤溪在清代原屬廣州府新寧縣，後因廣東土客械鬥，死傷百萬，於同治六年（1867）劃為赤溪廳，安置原居新寧縣之客家人。²⁹「赤溪東西南三面瀕海，山巒環疊，與內地交通隔闕，故風氣習尚亦頗殊焉。然其民族團體，結合甚固，相親相愛。」³⁰地理隔闕使赤溪開發較晚，文教較落後，保留很多獨特的景觀和習俗，甚為排外。江逢辰客家人的身份卻很能融入當地，受到當地人愛戴。其〈赤溪雜詩〉三十首，詳細描繪當地風土民情的各方面，可說是以詩記錄赤溪最詳細者。其一：「畫界雄綏服，開疆過附庸。

²⁹ 見〈赤溪開縣事紀〉，收入王大魯修，賴際熙纂：《（民國）赤溪縣志》，民國九年（1920）刊本，卷8，頁1。

³⁰ 王棟：〈序〉，收入王大魯修，賴際熙纂：《（民國）赤溪縣志》，卷首，頁3。

誅茆多峒客，編戶半山農。版築增新插，田疇薄正供。此邦風物好，曾不識鯨衝。」(卷13，頁5)已指出赤溪地理、人口、經濟的特點。不過他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來描寫，而是投入其中。雖然赤溪落後，但風景秀麗，當地人民純樸、喜讀書，使他頗樂於此，比之繁榮的廣州城，此處更感親切。其十一：「一道風同俗，三州意最親。誰知赤溪長，仍是舊鄉人。江水連山碧，湖花滿樹春。故園縱千里，父老白頭新。」(卷13，頁6)同為客家文化區，風俗相同，加上縣長是同鄉，使他有如在家鄉之感。又如其十二：「自關雲林界，神遊紫翠間。桃源在人境，逢島訝仙山。比戶春同醉，衡門夜不關。終年絕干謁，誰似守宮間。」(卷13，頁6)課堂之餘，時常率學生尋幽探秘，有感山水之美，如處桃源，所遊之處多刻石留詩，並有《赤溪詩文集》。加上他執掌書院，「自是縣人稍知窮經嗜古，士風為之一變」。³¹能夠實踐傳道育才的理想，在外人眼中落後野蠻之地，在他筆下卻是純樸簡古。他以文學重新塑造了赤溪的精神內涵，恰似東坡的寓惠書寫為惠州帶來新的文化。

不過與江逢辰日常生活最密切、文學景觀最集中，並寄寓了他最深厚情感的要算是惠州西湖。他居處距離西湖十分接近，日夕遊憩，自然成為筆下一個重要的主題，其〈惠州西湖權歌〉同樣以民歌風格寫成，展現民間生活與西湖的密切關係，如：

不數杭州與潁州，點翠芳華明月洲。東坡去後看明月，曾照東坡湖上游。
(其一)

菱溪茨浦水生時，共郎搖搖櫓一枝。拜神好到摸子廟，打魚莫到放生池。
(其二)

桃花一株柳一株，六隄有條係姓蘇。豐湖鱷湖可分別？原來都是一西湖。
(其四)

人心好比西湖水，一波纔伏一波興。人生好似西湖塔，到底一層隔一層。
(其五)

六如亭路多垂楊，紅菱翠藕開野塘。郎坐船頭妾船尾，朝雲墓上去燒香。
(其六)(卷1，頁3)

³¹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民國)赤溪縣志》，卷6，頁36。

惠州西湖原名豐湖，因東坡寓惠才改名西湖，「湖遂與杭、潁齊名」，「其〔東坡〕精神長存山水之間，成內美焉」。³² 故其一將惠州西湖與杭州、潁州西湖相比，強調東坡在惠州西湖的雅遊，大有宣示故鄉的文化風物不讓於杭、潁之意。其二、其三「拜神好到摸子廟」、「六隄有條係姓蘇」用粵語入詩，親切有味，正是民歌特色。其五以大家習見的西湖景物比作人情世態，設喻巧妙鮮明；其四、其六又提到蘇堤、泗洲塔、六如亭、朝雲墓等景觀，不但是後世追慕的「蘇跡」，也成了鄉人生活的一部分。

〈湖上雜詩〉同樣寫西湖上的景物，但有著更深一層的意涵（引者按：小字為《遺集》注）：

惠陽講學前朝盛，粵派王門自此開。我行忽憶薛夫子，不厭頻尋蕭寺來。
惠陽書院，薛中離舊講學處，在永福寺側。（其四）

湖上金吾葉氏園，錦衣曾對月開尊。而今無復知園處，零落龍塘舊子孫。
黃塘舊有葉猶龍錦衣園，卽陳獨漉、屈華夫詫酒悲歌，彈明莊烈帝御琴處也。
（其五）

無礙山房招鶴廬，汀洲遺迹漸荒蕪。分明七十年間事，遺老如何一个無？
嘉慶間，太守伊公築精廬湖上，招都人士游，極一時文醺之樂，今罕有知其處者。
（其六）

大宋風流筆陣師，蔗竿舞後興尤奇。軒然壁上龍蛇動，想見狂揮五別時。
宋芷灣題〈五別詩〉澄觀樓東壁，以蔗竿代筆，今墨色如新。（其七）（卷6，頁6）

西湖不只是遊玩的景點，他以薛侃（1468–1545）、陳恭尹（1631–1700）、屈大均（1630–1696）、宋湘（1756–1826）等前賢與西湖的連結，說明西湖背後更有著學脈傳承、遺民大義、醺遊結社、藝術創作的文化意涵。

除了西湖，江逢辰筆下另一個經常出現的文學景觀是羅浮山。《元和郡縣圖志》載：

羅浮山在（博羅）縣西北二十八里，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高三百六十丈，周迴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焉。³³

³² 張友仁編著：《惠州西湖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5。

³³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清乾隆間，卷35，頁11。

羅浮山為道教十大名山之一，天下第七洞天，因葛洪(283–343)在此煉丹而聞名遐邇，景觀甚多，高低錯落，分佈甚廣。這與西湖地勢平坦、景觀集中、易於展現日常活動的情況不同。江逢辰採用一景觀一詩的寫法，透過詩題中的動向指示明確作者行蹤，再以具體遊蹤將之連結起來，可使讀者如隨作者一起遨遊羅浮山，如同遊記。這些景觀多有宗教氣息，出塵絕俗，葛洪的遺跡尤其是主體景觀，如〈沖虛觀〉：

谿盤水東迴，雲策山南覩。稚川有古庵，長松被蘿薦。
其西深且邃，活綠動風篠。人行碧天際，水石窮幽妙。(卷11，頁4)

〈稚川衣冠冢〉：

仙蛻弗可尋，蛺蝶飛春山。長林不斷色，烟巒開翠顏。芝朮道人采，
雲霞仙子班。千年長生訣，煮石真癡頑。至人本無身，縱浪大化端。
吾愛抱朴子，胸有不死丹。游神在八表，想象空人間。(卷11，頁4)

洞天乃是聚天地靈氣，易於修練登仙之地，葛洪又是因嶺南出丹砂，故意來此煉丹，相傳最終得道成仙，因而羅浮山是人仙共處、由人間可通仙界之域，即使飲酒，也可「招要雲中人，酌此山中酒」、「百神享帝觴，餘瀝亦千斗」(〈會酌流杯池上〉，卷11，頁5)。沐浴在如此的宗教氣氛中，令人有出塵之想，彷彿山上的花草木石都是神奇靈異之物，例如他遊五龍潭，就會想像「伏石起觚稜，噴浪翻蚪龍」、「髮毛森古冷，鱗甲驚奇蹤」(〈五龍潭〉，卷11，頁4)。前人曾記錄羅浮山腳有如同桃源一樣的梅花村，東坡〈再用前韻〉有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³⁴但後世已難再尋見，江逢辰經過當地，只能發「空山何處所，香林無定指」(〈循麻姑壇過梅花村〉，卷11，頁4)、「香林不可接，清夢空山月」(〈尋梅花村〉，卷11，頁5)的慨嘆。不過，據他在詞作〈河傳〉的序中所記：

羅浮梅花村，自趙師雄夢之，柳子厚錄之，蘇長公歌詩之，而羅浮之梅，遂為天下絕特。……咸豐間，韓侍御、何解元就金沙洞口彷彿其地，

³⁴ 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38，頁4458。筆者按：本文所引蘇軾之作，悉引錄自此書，逕於引詩及引文後標明「《蘇集》，卷次及頁數」，不另作注。

補屋築觀，亦韻事也，今亦湮廢。余同年陳翰林復重新之，補梅數株，龍主事亭其地，即名之曰松風，是皆有功於梅花者。(卷18，頁13)

可知曾有人擬兩度恢復此景觀。他們屢次要重現梅花村，可見其象徵性，也愈益增加其仿如人間仙境、不可尋覓的傳說意味。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指出，「場所」(place)不只是抽象的「區位」(location)，而是由具體事物組成的整體，決定了一種「環境的特性」，即場所的本質，具有一種無法以科學概念加以分析的獨特氣氛。只有詩可以「將科學所喪失的整體性具體地表達出來」。³⁵不管是西湖景觀的集合、並置式呈現方式，還是羅浮山景觀串連的呈現方式，都表現了一種整體性，一種一致的特質和氣氛。羅浮山宗教性的、「出世」、「隱世」的特質和氣氛，與西湖作為日常生活背景，蘊含教化、興亡、愛情等較為「入世」的意涵有別。這兩種內涵，頗能反映嶺南文化的兩面：既是偏遠的、超然的、傳說的，亦是世俗的、實在的、歷史的，兩者互為補充。

(二) 對東坡寓惠景觀的書寫

段義孚曾說：

其實，戀地情結並非人類最強烈的一種情感，當這種情感變得很強烈的時候，我們便能明確，地方與環境其實已經成為了情感事件的載體，成為了符號。³⁶

惠州有不少美景，但首先賦予這些美景人文意義、風雅精神的，卻是東坡。東坡與惠州已密不可分，成為江逢辰筆下經常出現的「符號」。

蘇軾性格中既有高蹈隱逸、嘯傲山林的出世一面；亦有濟世為民、與百姓同悲喜、享受平凡生活的入世一面，恰可與惠州的景觀互相闡發。他在〈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中自稱「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蘇集》，卷38，頁4430)未入惠州城便先登羅浮山，遊沖虛觀、朱明洞等景觀，留下〈題羅浮〉

³⁵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華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

³⁶ 段義孚：《戀地情結》，頁140。

和〈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雖因戴罪之身不能隨意出城，仍寫信與表兄程正輔（生卒年不詳）表示欲重遊羅浮，可見其念念不忘。後來又多次暢遊充滿神話、傳說色彩的白水山，〈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謂：「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蘇集》，卷39，頁4657）另一方面，他又遍遊西湖，並留下蘇堤、六如亭、朝雲墓、等「蘇跡」，其他寓惠詩歌都可見他樂於融入百姓生活。

江逢辰傾慕東坡，性格中亦包含這兩種特質，對尚存的「蘇跡」，多所步趨，對已不存者（如梅花村），也著意尋訪遺址。筆者將東坡在寓惠詩中提到的具體景觀，與江逢辰相關之作相對照。從附表2中可見，對於東坡寓惠的足跡，留下景觀和詩歌，除了清朝時已圯的逍遙堂外，每處「蘇跡」江逢辰都有參訪或賦詩。他的〈和東坡寓惠詩序〉，指出東坡的流寓對當地的影響：

又以其〔按：指東坡〕所見所聞，煌鑠耳目，揮霍珠玉，使天下之人，世世之人，知其人〔按：指江逢辰〕之鄉有如是之瑋麗連犖，葱隴蒨絢，如蓬萊方丈之山，桃花之源，紫翠縹緲，白雲雍雍，鷄犬閑閑，固在人境。（卷17，頁1）

他指惠州雖有人間仙境，但經過東坡妙筆，才聞名天下，流傳至今。又謂：

合江之樓，嘉祐之寺，白鶴之山，公所棲神，環拱吾家，錯羅几案。其湖山草樹，江郊雲物，又皆公所低徊眷戀，不忍決去。（卷17，頁12）

說明自己正處在這些東坡不忍離去的美景中，居於其間亦受東坡精神的薰染。然後他又細數東坡寓惠喜愛之飲食、遊歷的地點、同遊之人物，進而指：

宜公見吾鄉之山，則曰：「何其似吾蜀道也！」……入清遠峽，聞人道惠州風物之美，則色然喜。及至，又謂仿佛曾游者，若歸其家焉。曾無一毫生死恐懼，流離顛沛，咨嗟怨對之意。（卷17，頁1）

〈豐湖書藏蘇祠記〉亦云：「又思公之至惠也，不但無慨歎鄙陋，而且愛其風俗之美；不但無愁苦饑餓，而且頌其土物之繁；不但無怨對訕謗之言，而且有若將終焉之意。」³⁷言下之意，惠州彷彿是東坡的第二個家鄉。

³⁷ 江逢辰：〈豐湖書藏蘇祠記〉，收入惠州市惠城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惠州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22。

鄒建軍指出：作為一門學科的文學地理學，不僅僅只是要研究文學文本，同時也要研究一個地域或一個地方的文學景觀、文化景觀之所以能存在的意義，探討在整個歷史上，詩人作家們是如何建構這些文化景觀的。³⁸ 惠州白鶴峰和西湖的景觀群，很多都是因東坡的建構或宣揚，才成為著名的文學景觀，在此之前，白鶴峰不過是縣治後的小山丘。東坡視惠州為終老之地的象徵，就是在西湖東面不遠處之白鶴峰上建的居所。《(嘉靖)惠州府志》載：

東坡故居在白鶴峯上，宋蘇軾謫惠卜居於此。有堂曰德有鄰，軒曰思無邪，小齋二，曰睡美處、曰來問所，有亭曰娛江，亭之左有硃池，右有墨沼，有小圃，中有亭曰悠然。³⁹

居所自成一箇集中的景觀群。其〈遷居〉、〈次韻子由所居六詠〉、〈和陶移居〉、〈和陶時運〉等，都顯示東坡以此地為歸宿之意，無疑加強了他與惠州的情感紐帶。後來東坡故居改為東坡祠，到任惠州的官員都必須拜謁，成為惠州的文化象徵。江逢辰經過白鶴峰故居，寫下〈東坡白鶴峰故居詩和楊誠齋正月十二日遊故居其北思無邪齋真跡猶存韻〉：

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依然忠愛動人主，豈有高厚供詩囚。故鄉謫所可不辨，築室甘住青峰頭。此老神全照百世，空洞一洗人間愁。……頗憐去公八百載，吾道幾欲沈滄洲。誠齋持節幸先至，不然嘯傲猶能不？頭顱如許矢報國，孤憤痛苦淚不前。收後黨禁相祖述〔引者按：應作「孤憤痛哭淚不收。前後黨禁相祖述」〕，悵望一喟交稽鈎。梅州亦有鐵漢樓，誰與弔者風颼颼？(卷16，頁5-6)

首兩句在惠州流傳甚廣。宋代以前，惠州在歷史上寂寂無聞，縱有名產美景，亦被視為蠻夷之地。東坡能融入當地人的生活，體會風景的美好、物產的豐盛、人情的純樸，歌之頌之，使惠州在世人眼前一亮。東坡〈和陶時運〉其三：「我視此邦，如涖如沂。」(《蘇集》，卷40，頁4814)，視惠州為涖沂。江逢辰〈赤溪雜詩〉其二亦云：「海濱鄒魯意，喜有讀書聲。」(卷13，頁5)，視赤溪為鄒魯。後者受前者之感染，十分明顯。

³⁸ 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引論》，頁26。

³⁹ 姚良弼修，楊宗甫纂：《(嘉靖)惠州府志》，明嘉靖刻本，卷5，頁13。(筆者按：小字為《(嘉靖)惠州府志》注。)

惠州因東坡而進入文學史中，白鶴峰也成了重要的文學景觀，雖然世道變更，但只要白鶴峰猶存，就能盛載東坡精神，啟迪後人。江逢辰〈白鶴峰謁蘇文忠公祠五十四韻〉從「忠節三朝著，雄文百代懸。羅浮自東峙，鶴嶺記南遷。」開始倒敘東坡因新舊黨之爭，被謫嶺南的經歷，以及他在惠州的生活狀況，最後扣回祠中所見：

遺像清高肅，觀瞻展拜虔。韓山真鼎足，蜀黨若齊肩。公自成千古，時難受一廬。唐吳嗟後斥，黃晁得薪傳。北海金齋膾，錢塘藥玉船。至今看采擷，亦足報明燭。侍櫺留餘愛，趨庭配象賢。精靈歸玉宇，神曲唱銅絃。白水聞潭洞，黃柑古豆籩。高山如可仰，惟願執公鞭。
(卷7，頁6-7)

「惟願執公鞭」可見踵武前賢之意。相比〈白鶴峰謁蘇文忠公祠五十四韻〉以賦法鋪敘東坡寓惠的經過，〈白鶴峰蘇祠古棉花歌〉則用比興，從白鶴峰蘇祠前的古木棉樹切入，先說木棉是嶺南最雄偉的花樹，花開時如紅光萬丈：

南方花樹最雄偉，無過鶴峰雙木棉。古幹槎枒拔地起，萬丈光芒紅燭天。一樹千萬枝，一枝千萬花。雲來朵朵變奇錦，風吹片片飛朱霞。疑是天上白榆樹，仙人狡獪塗丹砂。又疑珊瑚出海底，赤光豔豔燒空起。

繼云：

不知有此峰，幾年有此樹。又復幾年坡公來，卜居峰頭作流寓。樹不必種自公，公不必定愛樹。但覺公曾寓此地，至今草木皆光氣。去公八百年，花開花落雲水邊。合江之水相蕩漾，春風化作雲霞鮮。芒寒色正何巍然，勁骨直下沈重泉。大步濶視無纖妍，虬髯劍佩來朝天。煒煒煌煌，因花思公之文章；轟轟烈烈，因幹見公之大節。嶺海木棉何其多，老死空谷誰作歌？(卷2，頁5)

詩以祠前的古木棉為嶺南的象徵，因東坡的到來而光芒煥發。東坡去後，又因木棉而傳其精神於後世，兩者相得益彰。江逢辰用象徵和襯托的手法使兩者關係更為緊密，加強場所氣氛的一致性。其〈過山廬有感三十二韻〉亦云：

頗憶當齟齬，初經尚嘯歌。髯奴森似戟，雛燕疾於梭。活碧簾垂竹，填紅檻擁荷。林巒佳窟宅，草樹美盤陀。……重記兒行路，愁聞里按籩。

綺齡看鼎鼎，高會幾皤皤。汲古容修綆，延暉悼短戈。墓門悲有棘，
精舍總生莪。後勁誰相繼，前型得善摩。雅懷追正始，深興發婆娑。
壽考看山木，聲華秘澗蘊。雲林堅舊約，泉石起沈痾。井食冰凝甕，
江迴帶合羅。頻來應不厭，憑弔悵如何！（卷5，頁2-3）

他憶述從前白鶴峰故居風景秀美，是高會雅集之地，現在卻頗見零落，景觀寄寓的不只是某一時期的人物事件，更反映後續狀況的動態變化。「後勁誰相繼」一句，似是疑問，但從「前型得善摩」、「雅懷追正始，深興發婆娑」來看，他是以東坡精神承傳者自任。他又將自己的遭遇比擬東坡，如〈閏四月十三日同張衛齋許齋昆弟廖君栗遊七星巖歸遇大風雨衝野潦而過衣履盡濕歸作是詩〉寫他與友遊七星巖回程時遇雨，衣履盡濕，引來城中人觀看，詩云：「吾生實憂患，胡為免蹉跎。入城驚婦孺，聚觀笑齒呿。頗類東坡翁，簑笠惹口舌。」（卷8，頁6）將自己的遭遇比作東坡在海南遇雨，向農家借穿笠屐，引人圍觀的事跡。這種比擬，加強了東坡與自己的聯繫。

除了白鶴峰，西湖也是重要的「蘇跡」。江逢辰指西湖「懷麗毓秀，負奇閎特」，但如高賢逸士，隱遁於世，一直無人賞識。方志對東坡寓惠前的豐湖，只載：「廣袤十里，治平間陳侑領經畫，築堤截水，湖之潤溉田數百頃，葦藕蒲魚之利歲數萬。民之取於湖者，其施已豐，故謂之豐湖。」⁴⁰只敘述其經濟效益，毫無風雅意味，也未凸顯任何景觀，但自東坡賦遊而易名西湖後，「一旦使其名赫然播四方，與夫名山大川相頡頑，而動天下後人之流慕，則自有宋蘇文忠公始」。⁴¹豐湖與西湖，名異實同，但西湖之名卻賦與了與杭、穎西湖相匹的風雅之意。東坡可說是西湖的象徵，他創造了不少西湖的景觀。東坡之妾王朝雲（1063-1096）葬於西湖，「東坡侍妾朝雲墓在西湖孤山棲禪寺側，建六如亭」，⁴²「東坡媵朝雲誦《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絕，東坡用以題其墓」。⁴³故名「六如」，至今仍在。朝雲與東坡鶼鶼情深，其香骨埋於西湖，與土地結為一體，人地的關係就更密切。相比白鶴峰風雅傳承、文章氣節的象徵，朝雲墓和六如亭則更具情感的意涵。江逢辰的〈六如亭〉其三：

⁴⁰ 劉澗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清光緒十年（1884）刊本，卷3，頁碼模糊。

⁴¹ 江逢辰：〈豐湖書藏蘇祠記〉，頁122。

⁴² 劉澗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卷28，頁1。

⁴³ 同上注，卷4，頁19。

金仙縹緲禮浮屠，玉蛻銷沈只綠蕪。微雨棠梨作寒食，秋風青草泣童烏。
愛茲苔蘚二三尺，擬補梅花一萬株。耆舊吾州半搖落，後來好事可能無？

東坡曾在朝雲墓旁種滿梅花，江逢辰「擬補梅花一萬株」大有藉文學景觀之再建立，效法、紹述東坡之意。後句看似疑問，卻不難看出繼往開來之志。事實上，江逢辰與李綺青等確曾有西湖上結紅棉詩社的「好事」。其四：

野竹秋蒿掩墓門，天涯芳草易黃昏。風前曾隕先生涕，泉下誰招倩女魂？
詎有朝華能礙道，可將琴操試同論。傷心一曲孤鴻影，付與沙汀冷月痕。
(卷6，頁5)

亦透過景觀的觸發，思接千載，想像東坡在墓前哭祭的情景。

東坡寓惠之時，西湖上的橋屢建屢壞，經常有人失足墜湖。他不但提出修橋的建議，更將御賜的犀帶捐出，「紹聖三年〔1096〕蘇軾出上所賜金錢築焉」，⁴⁴籌款募資，修築西新橋。同年，在城東惠陽門外，「道士鄧守安以舟為浮橋，蘇軾捐犀帶助成之」，⁴⁵建東新橋。兩橋修妥後，作〈兩橋詩〉：「一橋何足云，謔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蘇集》，卷40，頁4759、4762)鄉人齊集慶祝，故兩橋象徵東坡對惠州的貢獻，對鄉人的關愛。他與鄉人同憂同樂，鄉人亦對他十分敬愛。江逢辰〈和東坡二橋詩〉云：「隨地見陰德，道路除蒺藜。飲酒慶永惠，一舉直到臍。」又云：「病涉得輿梁，苦旱見雲霓。況今無鱷魚，惡溪成好溪。……建橋橋有神，空設無盡梯。至今夢無親，花葉成春泥。」(卷10，頁1、2)正是歌頌東坡的遺澤，八百年後鄉人仍感其恩德。

從上述可見，鄉邦書寫是江逢辰詩歌的一大主題，他強調惠州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獨特的物產、風景，不弱於中原，寄寓了對故鄉的自豪和眷戀。尤其是東坡在惠州留下的眾多文學景觀和文學資源，使江逢辰視其為鄉邦的象徵，在對「蘇跡」的遊覽和憑弔中，展現其承傳前賢風雅的意識。

⁴⁴ 劉淮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卷5，頁5。

⁴⁵ 同上注，卷5，頁1。

四、江逢辰〈和東坡寓惠詩〉的互文性與意義

江逢辰不只通過對景觀的書寫追慕東坡，更效法東坡和陶，以古典詩歌特有的「追和」創作形式所包含的互文關係，「親近」東坡，展開對話，進而繼承其精神。考察他〈和東坡寓惠詩〉的互文性，是分析其東坡情懷的關鍵。

（一）「追和」的創作形式與互文的關係

《遺集》中最特別的部分要算〈和東坡寓惠詩〉。東坡寓惠所作之詩、文、詞，由惠州(博羅)學者張宣(約1553–1636，一作1557–1641)輯為《東坡寓惠集》後，鄉人代有增補、注釋和重刊，江逢辰理應讀過。他將追和東坡寓惠之作輯為一卷，不論是否受此啟發，都是一個創舉。據本文作者統計，東坡寓惠期間有詩124題共187首，〈和東坡寓惠詩〉中追和了33題共48首，散見其他卷中的另有6題共11首，合《遺集》中共有和東坡寓惠之作39題59首(另有3題共3首所追和的非寓惠之作)。在近代嶺南詩人的作品中，東坡作為一個文學、文化的符號，不管是以典故、次韻、同題、「壽蘇詩」等方式引用、呈現，都尋常易見。但追和——尤其是有系統地追和東坡寓惠之作，就筆者所知，江逢辰應是近代嶺南唯一的詩人。翁方綱以崇拜蘇軾聞名，觀其《復初齋詩集》固然有不少與東坡相關的詩歌，但追和之作的數量卻遠不如《遺集》，亦非專門追和東坡某地之作，更不見將之輯為一卷之舉。

以上分析，是要表明江逢辰和蘇之舉的特殊性，而非說江逢辰比翁方綱更傾慕東坡或更能承繼東坡精神。不過，有一大因素確是江逢辰具備而翁方綱沒有的：東坡流寓之地即江逢辰生長之地。這種土地與情感所形成的紐帶，與單純通過閱讀和研究去把握東坡精神是不同的。〈和東坡寓惠詩序〉云：

公不出蜀，猷將尋峨眉，問紗縠，況公親陶龍魚之鄉，若知八百年下有堅結深嗜其人者。故出其真精瑋靈神英於溲瑋漠冥，相為鼓盪，汲引而使之進於道。……其人已居是鄉，厚公之情，接公之靈，弗引吭續喙，擊鐘挽強，闐闐軍張，豈夫哉?(卷17，頁1–2)

江逢辰將自己對東坡的追慕，解釋為一種神秘的聯結。東坡如不出蜀，依然可以在故鄉尋幽探勝，得山川之趣，但東坡卻跋涉千里而來南荒，彷彿知道將來會有人踵武其道，故留下種種遺跡、詩文、逸事，以為啟迪接引。八百年後的江逢辰既生長是鄉，承傳東坡精神是理所當然的。至於為何要以追和的形式來承傳，他說：

寓惠之作，公爲之，天爲之也！予從而和之，其他作與惠有連者及焉，非私惠也。情出於天，此亦予之天也。公愛淵明，至欲盡和其詩，又謂：「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公何人，予何人，能不以公道夫先路，發軔蒼梧，總轡扶桑，驅飛廉與望舒，鸞鳳翱翔，雲霓陸離，而與公為歸哉！（卷17，頁1-2）

詩序中的「天」，有天性和天意的意味，乃天時地利影響下，人的性情受到感動、不得不為的自然之舉。接著他轉從文學的角度，上溯「追和」這一形式的淵源。他將東坡愛陶淵明（約365-427）及陶詩而盡和之，作為他愛東坡及其詩而欲盡和之的依據，形成「淵明—東坡—江逢辰」的「追和」和「承傳」的脈絡。⁴⁶

唱和是詩歌常見的創作、交流方式，但一般而言，唱和是指處在同時期，能互相交流的人，一人有意或無意地首唱，引起一人或多人答和，有時原作者會再有回應，形成多次疊韻、次韻的連鎖創作，唱和通常在較短時間內進行。要之，即強調原作者與和者所處時期相同或相近，及創作方式的互動性，是一個雙方都有默契的行為。「追和」既云「追」，即指原作者創作的時間與和者創作的當下相距較遠，原作者可以是和者所及見之人，也可以非同時代之人，本文所指的乃是後者。既非同時代之人，原作者便沒可能回應，因而不構成互動，追和的創作過程是單向的。不過，在追和的過程中，和者會對原作者建立一個形象，這形象投注了和者對原作者的理解及想像。簡言之，即作品中往往帶有和者的心理投射，既是追和原詩，也在追和的過程中與自己對話，審視自我。

江逢辰點出東坡追和淵明的原因及精神，也同樣能用於考察他的和蘇之舉。雖然在東坡之前的其他詩人已有追和古人之作，但數量不多，直到北宋始較為普遍。⁴⁷東坡和陶可說是數量既多，成就又高，具有典範意義之舉，蘇轍指出：「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自東坡。」⁴⁸其前半之論，學界已指出有誤，但若從量多質高，作為文學史中起典範作用的第一人

⁴⁶ 筆者按：從江逢辰欲向「公愛淵明，至欲盡和其詩」效法的這一點來看，他也似乎欲盡和東坡寓惠詩，奈何英年早逝，故無法竟全功。

⁴⁷ 筆者按：據詹卉翎的考察，唐代追和古人之作的總數，大約不超過三十首。見詹卉翎：《北宋唱和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頁110。關於追和詩的界義、分類及在北宋的發展，可參此文第四章第一節。

⁴⁸ 蘇轍：〈子瞻和淵明詩集引〉，載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後集》，收入《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21，頁1401。

而言，則後半之論，亦不無道理。雖然東坡早在廣陵時已有〈和陶飲酒〉，但有計劃地大量創作，〈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並引〉序中所說「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蘇集》，卷39，頁4509），卻是在惠州時期。張兆勇比較〈和陶飲酒〉和〈和陶歸園田居六首〉，認為：

蘇軾至此才找到「和」最切實的角度，即此才定位所謂和者實質上是通過向陶困惑的接近而再度感懷、體悟，借淵明的所遇、所思、所想對自己進行梳理。⁴⁹

他指出其惠州經歷對和陶創作的影響。觀其寓惠和陶之作，惠州的風土民情對他真正安時處順，出現終老此地的想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東坡以追和的創作方式「親近」淵明，江逢辰亦以追和來「親近」東坡。如學者所指：「運用蘇軾所確立的範式來追和蘇詩，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⁵⁰為何他們都選擇追和而非其他的創作方式？「互文性」的概念可以提供一個解釋。互文性不同於傳統修辭學所指的互文，而是法國文學評論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於1966年提出的一個概念，指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引用和吸收，所有文本都處在不同文本所編織的關係網中，聯結亦轉化著其他文本，因而要了解一個文本，就不能只局限在該文本，而須考察其他文本的符號系統如何以不同的形式被移至另一系統，形成新的關係。⁵¹ 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是對結構主義的解構和批評，是一種新的文學觀念。隨後，法國的文學理論家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2018）對之作作了具體的界義和分類，使之成為易於操作的文本分析工具和方法。他區分了五種跨文本的關係：一、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出現，例如引語；二、標題、副標題、前言、跋等「副文本」（paratext）與正文的關係；三、聯結一個文本與它談論的另一文本的評論關係，即「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四、由藍本「嫁接」（grafted）到另一文本的「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關係；五、副文本提示但不明確的關係。當中，熱奈特特別強調

⁴⁹ 張兆勇：《蘇軾和陶詩與北宋文人詞》（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4。

⁵⁰ 金甫嘜：《蘇軾和陶詩考論——兼及韓國和陶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54。

⁵¹ 詳參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焯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6。

「承文本性也是文學性一種普遍形態(程度不同):沒有任何文學作品不喚起其它作品的影子」。⁵²

雖然如克里斯蒂娃和熱奈特所認為,所有文學都有互文性,但中國傳統詩歌的觀念和創作方式,使其互文性格外明顯。蔣寅指出中國以古為尚的觀念,使摹擬成為經典形成以後的普遍創作風氣。他將形成詩歌互文的原因分為標題摹仿、主題摹仿和風格摹仿三類。標題摹仿指的是「前後作品因標題相同而發生摹仿關係」;主題摹仿「許多情況下與標題摹仿重合,因為主題詞經常突出在標題中」;風格摹仿更為普遍,「因為古人通行的師法原則是得性情之近,就各體之宜,即選擇師法對象首先考慮與自己性情相近的作家」。⁵³追和某程度上就是一種模仿,如東坡〈和陶歸園田居六首〉,標題模仿淵明〈歸園田居〉,主題模仿〈歸園田居〉所寫的田園生活,風格上亦模仿淵明的自然質直,三方面都與原作構成互文。王天覺指出唱詩與和詩的三重關係中,便有「互文關係」和「模擬關係」。他分析其「互文關係」云:「唱和詩是作者間的『對話』,和詩本身就包含著唱和的背景、時間、地點、唱和雙方的關係、處境、心境等信息。」⁵⁴「模擬關係」其實亦可歸入「互文關係」之中,因為模擬之作亦會有意無意透露這些資訊,更重要的是:「無論作者是否有摹仿的意欲,只要他知道某個文本,寫作時就會意識到它的存在,筆下的文字從而與之發生關係。」⁵⁵和者必然知道原詩,才能有「和」的行為。此外,追和比一般模仿擬古之作更具互文性,卻少被注意的,是「和」的形式——次韻。這種中國傳統詩歌——特別是唱和詩最常用的形式,使得和詩的每一句都與原詩構成互文關係,因為不論是呼應原句,還是避免與原句落腳使用的詞或意思太相似(如蔣寅所說,「避」是一種「隱性互文」),⁵⁶作者創作時都須步步為營地回顧原句。有時只要原作足夠知名,不用透過副文本,只須通過和詩所次的韻腳,便可知原作。例如〈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依次和淵明

⁵² 見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隱跡稿本〉,《熱奈特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69-77;引文見頁79。

⁵³ 蔣寅:〈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文史哲》,2012年第1期,頁22、24。

⁵⁴ 王天覺:〈論明人的唱和詩體觀念——以唱和詩集序跋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學研究》(長沙)2022年第2期,頁115。

⁵⁵ 蔣寅:〈擬與避〉,頁26。

⁵⁶ 詳參上注,頁28-32。

〈歸園田居〉其一的「山」、「年」、「淵」、「田」、「間」、「前」、「煙」、「顛」、「間」、「然」，憑和詩的韻便很容易讓人想起原作，單在韻的層面便已構成互文。

江逢辰和東坡之作，便充分體現了互文性。與東坡和陶類似，江逢辰除次韻原作外，大量運用標題、副題、序、注等副文本，當中又以引語和對原詩或隱或顯的評論，建立與原作的互文關係，呼應原作。同時，他以什麼內容去追和原作，並非隨意的，而是經細心選擇，凸顯他的親身經歷與東坡境遇的相似性。

我們先考察簡單的例子。東坡寓惠的第一首詩是〈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翛翛荔子然。
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
(《蘇集》，卷38，頁4418)

江逢辰的和作〈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吾州風物由來美，未覽圖經動謫仙。白玉洞天誰可比，黃茆瘴癘豈其然。
收香么鳳常棲樹，出水鱖魚賤賣錢。更有梅花似庾嶺，時聞銅弩出龍川。
(卷17，頁3)

江逢辰和作的詩題，絕大部分都與原作一樣，其內容又與詩題相關，因而此兩者都與原作形成互文。如原詩寫東坡聽說惠州風物之美而神往，和詩亦是圍繞惠州之美下筆，特別是「吾州風物由來美，未覽圖經動謫仙」及「黃茆瘴癘豈其然」，在語氣和意思上都回應及補充了原作，似乎正與東坡對話一般。和詩與原詩的最後一聯語法結構雷同，又似是故意為之。東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最後四句云：「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尊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蘇集》，卷39，頁4570)江逢辰和云：「吾鄉嘉果信獨絕，黃州漫說桃花鱸。入閩但識君謨譜，釋果須補爾雅圖。」(卷17，頁9)讀者要了解江逢辰為何會說到鱸魚，就必須回顧東坡原詩，才得知江逢辰認為惠州荔枝比東坡在黃州所嘗的桃花鱸更味美。東坡原詩中又有「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一句，用蔡襄(君謨，1012–1067)〈七月二十日食荔支〉之典，同時蔡襄移知泉州時又撰《荔枝譜》。原作與蔡襄的文本互文，江逢辰「入閩但識君謨譜」句和東坡之餘，又借蔡襄文本與原作進一步互文。原作是和作的「前文本」，蔡襄之作又是原作的「前文本」，三者便構成了互文的網絡，加強「對話」的效果。

〈自笑〉一詩亦類似，東坡原詩寫其磨墨之感，江逢辰的和詩亦圍繞墨，但加以推宕，寫東坡製墨之法今已失傳，嘆道：「磨墨墨磨人，此語真足淒。東坡海外法，頗惜久已迷。」（卷17，頁4）「磨墨墨磨人」是引用東坡的〈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非人磨墨墨磨人」（卷16，頁1748）之句，讀者讀這一句就會牽引出東坡，故和詩又與〈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及原作互文。

江逢辰不少和詩都使用了副文本。東坡〈江月五首〉有小序：

……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棲禪寺，叩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蘇集》，卷39，頁4610）

此詩五首各以「一更山吐月」、「二更山吐月」等為首句，同時又以「殘夜水明樓」為韻，在形式上已與杜甫（712-770）的〈月〉形成兩層互文。江逢辰的詩序云：

坡公作江月詩，激賞子美「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判錢塘時，有〈八月十日夜看月〉詩：「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又〈催試官考較〉詩：「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又〈看潮〉詩：「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日中看。」即〈江月〉詩所謂「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者。夫同一月耳，同一人耳，境有所異，情亦隨之。「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讀公詩，雖閱千載，而公忠愛之心，可以悠然見矣。予亦常謂公詩五首，此十字特妙絕古今，子美之云，當屬公為宜。愛慕之餘，作〈後江月〉詩，即以公句引首云。（卷17，頁10-11）

序中對東坡詩的評論，正是副文本的互文性之一，他為「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追溯到更多的前文本。他的五首和詩又仿效原詩與杜詩的互文，嫁接「可憐人與月」作為首句。這便通過副文本和正文，與原作甚至杜詩構建起複雜的互文關係，讀者要了解和詩的內涵，便須連結其他文本來解讀。

再舉一例，東坡〈寓居合江樓〉寫寓居合江樓時之間適，和詩則從合江樓的角度，寫有幸得東坡入住而使湖山生色，最後四句云：「水眼山眉百態新，尚記風流斜人。誰知嶺南萬戶色，併作東坡一段春。」後有注云：

公寓居時，作〈臨江仙〉詞云：「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忘何處追遊，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陳[陣]，風轉柳花球。我與使君皆白首，休誇年少風流。佳人斜倚合江樓，水光都眼淨，山色總眉愁。」佳人即指朝雲也。(卷17，頁3)

注中解釋「尚記風流斜人」的出處；同時「誰知嶺南萬戶色」又引自東坡〈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嶺南萬戶皆春色」(《蘇集》，卷36，頁4440)。和詩的兩句都各自牽引出另一文本。

由上可見，江逢辰步趨東坡和陶之舉，追和東坡寓惠詩。他運用「追和」的詩歌形式，通過標題、副題、序、注等副文本與正文中嫁接、引用、次韻的方式，與蘇詩形成了多層互文關係。至於這些互文關係作用為何，下面將會探討。

(二) 對東坡寓惠文化的補充與承傳

互文性研究提供新的文學觀念，提供文本如何與其他文本形成互文關係的具體描述和理論框架，然而這種關係又如何有助我們理解江逢辰和東坡寓惠詩的深意？

唱和詩別於其他詩歌形式，在於它是唱詩及和詩的對話，使唱者及和者關係變得密切。如果只是就一個主題各自賦詠，便缺乏交流，唱和則提供了體裁、韻腳的互文框架，互相轉引、仿效的渠道，使風格漸漸趨近。追和詩是唱和詩的其中一種，但「和」的對象是古人，無法回應，因此和者在心中其實早已塑造了原唱者的形象，並在詩中展現，故和詩中常虛擬一個鮮活的、雖逝而未逝的原唱者。和者透過追和、互文的方式，牽連出前文本，其實就是召喚原作者的形象，因此和詩中常有與原作者交流、對話的語氣。江逢辰〈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有句：「不知東坡老居士，所到列仙何福庭？未能手撒綠玉杖，恐是誤讀黃庭經。與公笑期青羊石，毋令流落紅鞵銘。羨公生子得叔黨，永無災難儕公卿。」(卷17，頁3)問句的運用使得東坡如在面前，彷彿可以回應；「與公」句又使東坡如真實存在，可以同遊。前引的和詩〈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問君何為愛至此」、「頗憐東坡難忍俊」，亦有類似的效果。又如東坡〈與程正輔游碧落洞〉寫他與表兄遊碧落洞，欲尋仙避世，江逢辰和詩末句：「丹砂尚可乞，吾亦學長齡。」(卷17，頁10)著一「亦」字，有加入東坡行列之意。

關係的拉近使江逢辰更能體會東坡寓惠的經歷，對故鄉的認識和情感又深化和補充了東坡寓惠的精神。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 1936–2023)提到，互文性的作用之一就是「深化」，⁵⁷ 蔣寅亦說：

互文性研究對文本關係的考察不只着眼於一個文本從以前的文本中獲得了什麼，即「文本漸次吸收外部材料的過程」，其根本目的在於從文本的關聯中了解新出文本較原有文本增添了什麼，提升了什麼。⁵⁸

江逢辰是本地人，對嶺南、惠州的文化風物有更全面、切身的體認，同時作為晚生八百年的後來者，對東坡去後的遺澤和景觀變化，自然有深化、補充之處。東坡〈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是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概述聽聞的惠州，和詩則從本地人的角度和語氣，介紹「吾州風物由來美」，強調「白玉洞天誰可比」，「黃茆瘴癘豈其然」一句又為一般人對嶺南的誤解作辯護。最後一聯以「更有」凸顯嶺南風物之盛美外，又把嶺南歷史文明之發源上推至戰國時代。

東坡〈十月二日到惠州〉寫初來之感：

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蘇集》，卷38，頁4440)

詩中並無將惠州景色與其他地方比較。和詩則云：

能將荒落赫寰中，杭穎西湖合匹豐。大啟山林楚熊繹，流遺風教蜀文翁。
玉堂金炬來天上，老屋青蘿住水東。不是昌黎謫潮郡，邦人爭得識蘇公？
(卷17，頁3)

將惠州西湖與杭、穎西湖媲美，表現了惠州風光堪與中原比肩的信心。繼而從歷史的角度，上自西周，下至北宋紹聖年間，東坡來惠流傳風教建立嶺南文明的脈絡，強調東坡於此地的重要性。

又如〈遊博羅香積寺並引〉：

二年流落蛙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泫露酣嬌黃。
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

⁵⁷ 轉引自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頁5。

⁵⁸ 蔣寅：〈擬與避〉，頁26。

三山屏擁僧舍小，一溪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隄防。
霏霏落雪看收麩，隱隱疊鼓聞舂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
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肓。
(《蘇集》，卷39，頁4537)

東坡原詩寫香積寺附近的田園風光，以及興修水利設施的建議，想見豐收的景象。江逢辰和云：

東坡不棄來蠻鄉，要使荒落生光芒。吾州三年作寓客，無異出守杭穎黃。
溯江過嶺憶風物，道中尚賦馬負秧。青山繞郭似蜀道，嘖嘖樂土容發狂。
博羅亦有古山寺，長松翠葆森森涼。築塘東閘轉四杵，相度溪水能周防。
豈圖游玩縱清興，直欲前導為糝糠。便民有術行處是，樂歲無過禾黍香。
香積古寺雖已沒，此地尸祝宜壺漿。惰農惡令皆政害，安得起公箴膏肓。
(卷17，頁8)

同樣將惠州與杭州、穎州、黃州比較，因東坡而山川生色，並描述因其水利上的貢獻，受益至今，東坡當時的想像，於今成真。〈和東坡二橋詩〉的〈東新橋〉：「今觀二十舫，何止千萬濟。石矸貫鐵索，崩沸安輪蹄。臨流溯所創，婦孺能考稽。前時可集鳧，今則可集鷺。隔絕八百載，留此接引梯。」(卷10，頁1)；〈遷居和坡公〉：「縹緲紫翠居，壯此山川麗。讀公遷居作，老去詩律細。高懷八百年，飛快日月逝。摩挲古榕掄，尚道公所憩。乃知過化神，自有不朽計。」(卷13，頁3)；〈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芳華洲已夷，泗州塔高揭。千年飛日月，此劫亦非細。元妙古天慶，石存柏半逝。眷念紫清閣，根尚絡階砌。」(卷17，頁7)同樣是從東坡留下的景觀發想，追憶其事跡與風懷。

除了對故鄉風物的頌揚和對東坡精神的承傳外，江逢辰的和詩還回應了時代的議題。如前所述，東坡〈江月五首〉的序中說杜甫〈月〉：「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⁵⁹的首兩句「殆古今絕唱」(《蘇集》，卷39，頁4610)。

東坡〈江月五首〉表面上只是描述不同更次的月出之景，但江逢辰詩序中卻曰「而公忠愛之心，可以悠然見矣」，江氏為何有此說呢？這就須聯結到〈月〉

⁵⁹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7，頁1476。

的寫作背景，當時杜甫正流落夔州，故寫月亦寫己，宋人黃鶴（生卒年不詳）之注就指：「寡婦孤臣，情況如一，故借以自比。」⁶⁰江逢辰看到東坡頌讚並引用此詩的深意，乃是當時的東坡如同杜甫，都是流落異地的「孤臣」，都有忠愛之心。如果不從互文的角度去閱讀，蘇軾〈江月五首〉似只是描寫一清絕的月下情境，如尤侗（1816–1704）所評，寫「月白風清，良夜之樂」（《蘇集》，卷39，頁4616）而已，難讀出弦外之音。但〈江月五首〉卻透露了可通過互文角度加以解讀的線索：「五更山吐月，窗迴室幽幽。玉鉤還掛戶，江練卻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蘇集》，卷39，頁4615）當時嶺南乃清平之境，為何會有「鼓角」之聲？以「星河」與「鼓角」對仗，自然會令人聯想到杜甫〈閣夜〉的「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⁶¹特別是〈閣夜〉寫的亦是「五更」時分，兩詩因此構成了互文關係，東坡藉著「星河」、「鼓角」、「五更」的移用，以杜甫羈旅天涯之況來自比。由此可解讀其二：「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卧，唧唧蟲夜話。」（《蘇集》，卷39，頁4612）的「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乃東坡視月為自己高潔理想與胸懷的象徵，其四「皎皎為誰明」（《蘇集》，卷39，頁4614），不被君上知悉，如今只能夜夜羈棲於合江樓，對影自憐。這正是為什麼江逢辰讀出「而公忠愛之心，可以悠然見矣」的意味，乃在於〈江月五首〉與〈月〉的互文中，東坡表露了杜甫「寡婦孤臣，情況如一」的精神。

江逢辰的和詩除了描寫「江月」，亦借此抒發弦外之意：

可憐人與月，世事似翻瀾。千古只如此，明年何處看？
古愁山雨暗，清光潭水寒。蟾蜍嚙桂樹，忍使一鉤殘？（其一）

可憐人與月，共此漫漫夜。黃河難洗愁，何心醉花下？
古今一邱貉，賢愚相枕藉。人歸月亦沒，任付酸辛話。（其二）

可憐人與月，病夜猶強起。玄雲掩素光，心事亦如此。
不嫌抱微尚，月影照泥水。誰投三斛膠？不污巢由耳。（其三）

可憐人與月，漫道為誰明。耿耿碧天遠，蒼蒼銀漢橫。
人去月不去，人行月亦行。更聞籌海國，哀角起邊城。（其四）

⁶⁰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卷17，頁1476。

⁶¹ 同上注，卷18，頁1561。

可憐人與月，無用剖深幽。薄蝕還當夜，淒迷獨倚樓。
 白髮非年少，青山入暮秋。滔滔大江水，采采野人謳。(其五)
 (卷17，頁11)

此詩置於〈和東坡寓惠詩〉最末，當寫於後期。江逢辰關懷民間疾苦，詩卷中就有不少哀生民、刺時弊之作。他出仕為官，卻見官場的貪污黑暗；同情改革，與維新派友好，卻面對運動的失敗，加上晚清戰事連場失利，百姓日困，更是憂心忡忡。其詩襲用東坡的「可憐人與月」，是透過與原作的互文展現「忠愛之心」，但時勢不同，「月」一方面繼承原作，象徵高潔的理想與胸懷，另一方面又有了新的意涵：其一「世事似翻瀾」指時局變幻，尾聯以「蟾蜍嚙桂樹」喻君權被侵的寓意，十分明顯，「月」就轉換成君主的象徵；從其二的「古今一邱貉，賢愚相枕藉」，可見對世事的失望，亦因此才辭官還鄉，「月」又回到高潔理想與胸懷的象徵；其三「玄雲掩素光，心事亦如此。不嫌抱微尚，月影照泥水。」既是君權受侵，亦是心光難現，被泥塵所污的處境；其四更直接抒發對國勢的憂慮，思君之心和對理想的堅持，猶如月色，不離左右。其五寫終於不能迴避明月「薄蝕」的現實，而生「白髮非年少，青山入暮秋」之嘆。五首和作中的情緒起伏變化，比原作更為曲折。又如其〈上元作〉追和東坡〈上元夜〉，序云：「憶京師之游，兩度佳節，東事正起，嬉遊如故，慨和東坡上元作。」(卷17，頁6)原詩只寫東坡過去三年過上元夜的情況，和詩則極力形容北京燈會之盛大奢華，最後筆鋒一轉：「詎知邊城急，一金米數升。士卒凍欲死，安有火騰騰？」(卷17，頁6)形成強烈的反差。〈江月五首〉及〈上元作〉兩首和作，都是以樂景寫憂思，一方面加入時代議題，相較原作有了新的變化，另一方面依然承傳了東坡與國家、百姓憂戚相共的忠愛之心。

江逢辰借和詩與東坡對話，不只欲承傳其精神，也希望承傳其詩歌風格。詹卉翎將追和之作分為三類，其一是「和詩作者崇拜、認同原詩作者的人格與價值觀，甚至是自己身處相似的生命經歷中」，另一是「針對作品本身的學習和較勁」。⁶²但很多時候，兩者是難以區分的，因為原作者的人格與價值觀，正是形成其作品風格的基礎。故崇拜、認同其人格時，就會漸漸學習其風格；學習其風格時，亦會加深對原作者的崇拜、認同。蔣寅分析風格模仿的互文時，就指古人

⁶² 詹卉翎：《北宋唱和詩研究》，頁112。

更多不是模仿某些作品，「而是摹擬一種風格或抒情方式」。⁶³東坡和陶的學習意味就十分明顯：「蘇軾既然追和陶詩，單獨編輯成集，那麼，其學習陶淵明的意圖再明確不過了。」⁶⁴東坡如此，江逢辰亦然。詩歌的風格很大程度受題材、體裁、韻腳、用典、內容等因素制約，其和詩的體裁、韻腳與原詩一致，題材、用典和內容又貼近原詩，風格自然趨近。他早在1873至1876年間便開始追和，直到逝世以前，終其一生都以此方式學習蘇詩，故李綺青謂其「晚規宋格」、「清深之思，半參玉局」，自是知言。

透過江逢辰追和詩的互文性可看出他在追和原作的過程中進一步「親近」東坡，承傳其精神與風格。其詩內容上則加深對鄉土的描寫，補充了東坡文化在其逝世八百年後的發展，並加入了時代的議題。「互文手法使文本產生新的內容，這使得文學成為了一種延續的和集體的記憶。」⁶⁵江逢辰追和東坡寓惠詩，正是使東坡精神和鄉土之美透過詩歌延續下去，成為惠州乃至嶺南人的集體記憶。

五、結論

江逢辰的《遺集》流傳極稀，筆者首先在訪尋並加以整理的基礎上，勾勒其生平，介紹《遺集》的概要，重排卷次，凸顯其生平經歷與各卷詩歌的先後關係，使論述得以順利開展。嶺南詩歌由於嶺南文化傳統與地理環境，形成獨特的內容風格，當中有本土生發的因素，也有外來而最後融入本土的因素。筆者發現近代嶺南詩人之中，江逢辰的詩歌正好受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他生於嶺南，自然因此地人文地理而自豪，發之於詩，有著強烈的鄉邦意識。另一方面，與此密不可分的是，蘇軾雖是外來的文學家，卻在嶺南留下很多家傳戶曉的事跡，成為嶺南重要的詩學資源。江逢辰生長於東坡流寓的惠州，對東坡極為傾慕，他的創作與性情，都極受其影響，兩種因素互相結合，正好說明文化地理如何影響詩歌的內容風格。

江逢辰詩的一個特點，是有大量關於嶺南的遊覽記勝之作，表現對故鄉的深深眷念。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可以解釋他的「戀地情結」，他認為嶺南的文化歷史、山川風物，可雅可俗，可敬可愛，自有獨特之處，不亞於中原，甚至在

⁶³ 蔣寅：〈擬與避〉，頁24。

⁶⁴ 金甫暉：《蘇軾和陶詩考論》，頁255。

⁶⁵ 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頁81。

中原學術衰微時，嶺南反倒有利存養文士元氣。由於他家鄉遍佈「蘇跡」，他從小就在東坡文化的濡染中長大，此亦成為詩歌的重要題材。透過他對相關文學景觀描寫的分析，可知他不只以東坡為家鄉的象徵而自豪，也隱然有繼續前賢風雅精神之意。《遺集》的另一大特點，是以整整一卷的份量來追和東坡寓惠詩，效法東坡追和淵明。「追和」的創作方式體現了強烈的「互文性」，筆者借助互文理論，考察他的和詩與蘇詩形成多層互文關係，展開與東坡的對話。在詩歌的內容、精神上，江逢辰借追和的方式進一步頌揚故鄉風物，繼承東坡精神和風格之餘，還加入了時代議題。

附表 1：《江孝通遺集》各卷梗概

卷次及卷目 (原稿)	卷次及卷目 (按時序)	主要活動範圍	詩歌主要內容	數量
卷一 珠海集 癸酉至丙子 (1873-1876)	卷一 珠海集 癸酉至丙子 (1873-1876)	廣州	遊覽記勝	41 首
卷二 花源集 丁丑(1877)	卷二 花源集 丁丑(1877)	廣州、惠州	遊覽記勝	52 首
卷三 花源集 戊寅(1878)	卷三 花源集 戊寅(1878)	廣州、惠州	遊覽記勝、 記時事	34 首
卷四 大白集 己卯(1879)	卷四 大白集 己卯(1879)	惠州	遊覽記勝、 村居生活、 題贈唱酬	42 首
卷五 蘇山集 庚辰(1880)	卷五 蘇山集 庚辰(1880)	惠州	遊覽記勝、 記時事、 題贈唱酬	28 首
卷五 蘇山集 辛巳(1881)	卷五 蘇山集 辛巳(1881)	惠州	遊覽記勝、 記時事、 題贈唱酬	29 首
卷六 蘇山集 辛巳至乙酉 (1881-1885)	卷六 蘇山集 辛巳至乙酉 (1881-1885)	惠州	遊覽記勝、 記時事、 題贈唱酬	90 首
卷七 豐湖集 丙戌(1886)	卷七 豐湖集 丙戌(1886)	惠州 (求學豐湖書院 時期)	遊覽記勝、 記時事、 題贈唱酬	32 首
卷八 端谿集 丁亥(1887)	卷八 端谿集 丁亥(1887)	肇慶 (求學端溪書院 時期)	詠物、 遊覽記勝、 師友唱和、 擬古人作	56 首
卷九 廣雅集 戊子(1888)	卷九 廣雅集 戊子(1888)	廣州 (求學廣雅書院 時期)	記時事、 多雜體詩	51 首

卷次及卷目 (原稿)	卷次及卷目 (按時序)	主要活動範圍	詩歌主要內容	數量
廣通集 己丑(1889)	廣通集 己丑(1889)	廣州 (求學廣雅書院 時期)	多課藝之作	67首
卷十 西山集 乙未(1895)	卷十五 春明集 庚寅(1890)	鎮江、上海、京 津等地	遊覽記勝、 師友唱和	74首
卷十一 羅浮集 癸巳(1893)	卷十六 密菴集 辛卯(1891)	惠州	遊覽記勝、 師友唱和	119首
卷十二 金臺集 甲午(1894)	卷十一 羅浮集 癸巳(1893)	惠州	遊覽記勝	29首
卷十三 赤谿集 丁酉(1897)	卷十二 金臺集 甲午(1894)	北京、惠州	遊覽記勝、 論藝	21首
卷十四 西樵集 丁酉(1897)	卷十 西山集 乙未(1895)	北京	遊覽記勝、 題贈唱酬、 題畫、記時事	130首
卷十五 春明集 庚寅(1890)	卷十四 西樵集 丁酉(1897)	惠州、東莞	遊覽記勝、 題贈唱酬	23首
卷十六 密菴集 辛卯(1891)	卷十三 赤谿集 丁酉(1897)	赤溪	遊覽記勝、 題贈唱酬、 詠物、 和東坡詩	108首
卷十七 和東坡寓惠詩	卷十七 和東坡寓惠詩	廣府一帶	和東坡詩	48首
詩集存詩總數				1,074首

注：原書按卷次順序編排，見最左欄所示，不過卷次的順序卻不一致：從卷一到卷九按年份先後排列，但卷十到卷十七卻非按年份排列。這雖是原書的序列，但如果不加留意，視之為江逢辰經歷及寫作的先後次序，將會影響對其生平的了解。故作者按卷首所列年份重新排序為第二欄所示，在敘述上會更合乎順序，卷五、卷九各分兩部分，故共計十九卷。卷十七之內容為作者不同時期不同地方之作品按主題彙集而成，很難明確指定活動範圍，但主要是在廣府一帶。

附表 2：東坡寓惠詩中的景觀、其相關詩作及江逢辰相關詩作

景觀	蘇軾詩	江逢辰詩
羅浮山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詩作眾多，茲不贅錄
合江樓	寓居合江樓	寓居合江樓
白水山、佛迹岩、湯泉	白水山佛跡岩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詠湯泉	白水山佛迹巖 趙念白水飛虹圖歌 詠湯泉
松風亭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攀雲仙館詩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東坡釣磯	江郊	江郊
羅浮道院、棲禪寺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
嘉祐寺、林媪家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香積寺	遊博羅香積寺 與正輔遊香積寺	游博羅香積寺
逍遙堂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	
東新橋、西新橋	兩橋詩	和東坡二橋詩
朝雲墓、六如亭	悼朝雲詩	惠州西湖權歌 朝雲詩 六如亭 湖上雜詩 六如亭下作

景觀	蘇軾詩	江逢辰詩
<p>白鶴峰、東坡居所、 蘇祠、東坡井、 翟夫子舍、 林婆賣酒處</p>	<p>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 秀才二首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 石石盡乃得泉 遷居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 和陶移居 和陶時運</p>	<p>詩作眾多，茲不贅錄</p>
<p>泗州塔</p>	<p>江月五首</p>	<p>惠州西湖權歌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 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 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 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 寄邁迨一首</p>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編：《全粵詩》，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
- 方信孺：《南海百咏》，道光元年(1821)甘泉江氏藏影鈔元本。
- 江逢辰：《江孝通遺集》，自印本，1934年。
-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清乾隆間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 杜甫著，仇兆鼈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克朗(Mike Crang)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吳定賢：〈惠州才子江逢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惠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惠州文史》，內部發行，1997年，第8輯。
- 周漢光：《張之洞與廣雅書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金甫暉：《蘇軾和陶詩考論——兼及韓國和陶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林金水：〈戊戌變法成員江逢辰在赤溪〉，《炎黃天地》，2014年第2期。
- 姚良弼修，楊宗甫纂：《(嘉靖)惠州府志》，明嘉靖刻本。
-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 張友仁編著：《惠州西湖志》，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 張兆勇：《蘇軾和陶詩與北宋文人詞》，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
- 張志烈等校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 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六卷》，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1923年。
- 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麥哲維(Steven B. Miles)著，沈正邦譯：《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
- 惠州市惠城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惠州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曾大興：《文學地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 ：《嶺南文化的真相：嶺南文化與文學地理之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 王大魯修，賴際熙纂：《(民國)赤溪縣志》，民國九年(1920)刊本。
- 葉偉強：〈歸善縣城江孝子〉，收入葉偉強等：《惠州文史及其他》，惠州：東坡書畫院，1999年。
- 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3年。
- 劉淮年修，鄧掄斌纂：《(光緒)惠州府志》，清光緒十年(1884)刊本。
-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義譯：《熱奈特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
-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韓強：《嶺海文化：海洋文化視野與「嶺南文化」重新定位》，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
- 薩莫瓦約(Tiphaine Samoyault)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蘇轍著，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二、論文

- 王天覺：〈論明人的唱和詩體觀念——以唱和詩集序跋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學研究》(長沙)2022年第2期，頁112-19。
- 翁筱曼：〈蘇軾與嶺南文學——由清代學海堂之文學教學談起〉，《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50-55。
- 詹卉翎：《北宋唱和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 蔣寅：〈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文史哲》2012年第1期，頁22-32。

江逢辰詩的鄉邦意識與蘇軾情懷

(提要)

江曉輝

近代以來，地理與文學的關係越益受到重視，嶺南詩歌正是在其獨特文化與地理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獨特的內容風格，近代嶺南詩人江逢辰的詩歌便是當中的典型例子。江氏的《江孝通遺集》極少流傳，本文在訪尋並整理其遺集的基礎上，考察其文學創作，列舉其詩中出現的嶺南「文學景觀」，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研究他如何運用蘇軾寓居嶺南所留下的豐富文化 / 文學資源，展現嶺南風物的獨特之處；並透過「互文性」理論，具體分析其作品與「東坡寓惠詩」的關係，探究江氏如何藉由追和蘇軾寓惠的詩歌，繼承蘇軾精神，頌揚鄉邦之美。

關鍵詞： 江逢辰 蘇軾 嶺南詩 文化地理學 互文性

The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Su Shi Sentiment” in Jiang Fengchen’s Poetry

(Abstract)

KONG Hiu-Fa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since the recent times. Thanks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s of the Lingnan region, its poetry has developed its own distinctive content and style. Poetry of the modern Lingnan poet, Jiang Fengche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phenomenon. Jiang’s *The Posthumous Collection of Jiang Xiaotong (Jian Xiaotong yiji)*, with its limited circulation, has receiv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Posthumous Collection*, examines these poems, with regard to the Lingnan “literary landscapes” depi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it explores how Jiang utilized the abundant cultural and literary resources penned by Su Shi from the latter’s time in Lingnan, in order to showcase the unique customs, sentiment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 Through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s work and Su Shi’s poems during his sojourn in Huizhou. Comparing the literary landscapes in Jiang’s poetry and those in Su Shi’s poetry, this paper further elaborates how Jiang had carried on the spirit of Su Shi in praise of the beauty of his homeland.

Keywords: Jiang Fengchen Su Shi Lingnan poetry cultural geography intertextuality